



比较品性学： 发展理论的 哥白尼式革命

——评介阿兰·佩雷菲特的《信任社会》

邱海婴 / 文

[258/259]

《信任社会》(La Société de confiance)是阿兰·佩雷菲特毕其一生之精力,钩深致远,撰写的一部翘楚之作。佩雷菲特从法国高等师范学校和国立行政学院这两所法国超一流大学甫一毕业,就萌生了“信任理念”。这个“胎儿”在母腹中酝酿躁动了近50载方瓜熟蒂落。其间,佩雷菲特出版过多部著作,有些享誉世界,但他戏谑地说,“我的大多数著作都只不过是信任理念与各种不同机遇交会的私生子”(《信任社会》,前言,1995)。《信任社会》在作者心目中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而学术界一般也认为这部书是佩氏最重要的著作,是他的“精神遗嘱”。

《信任社会》原是佩雷菲特的博士论文。他特意选择了65岁过后这个再无资格问鼎大学教授资格的时候,广邀论文所涉各个领域国际公认的权威组成评委会,对这部论文进行严格的评判,尔后修润成书,由法国奥迪尔·雅各布出版社(Odile Jacob)出版。这不是一部单纯的经济著作或史学著作,也不是一部单纯的社会学著作。用作者本人的话来说,是发展理论研究中的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作者集人文诸学科之精华,创立了一门新的边缘学科,佩雷菲特称之为“比较品性学”(Ethologie comparée)。书名缀以副标题“论发展之缘起”,显见其立论之高远。这样一个大题目若无奥博的学识,敏锐的洞察力,新颖的研究方法,厚实的理论基础,实难有所建树。作者参阅研考了卷帙浩繁的典籍史料,但凡与发展有关的主要人文学科:历史学、哲学、社会学、宗教与神学、政治学、伦理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经济学、乃至生物学(神

经学),都进行了广泛的涉猎。全书正文分7大部分,计46章,附录16章,参考书目达数百部之多。这部书虽是作者数十年理论研究和实际考察的厚积薄发,但主要考论的是16世纪到19世纪的400年间欧洲基督教民族从和谐走向分化,从同一走向差异的历史沿革。作者从各个层面比较了诸国经济及社会发展之差距,剖析了根源,论证了文化因素是差异形成的主因。

作者首先对16世纪“差异出现之前”(第一部分,5章)西方基督教民族的状况作了一个概览,提出发展的肇始问题。经历了中世纪千年黑暗的欧洲已从生产、城市的变化、印刷术的诞生、教育、文化、精神等诸方面酝酿了日后某些国家腾飞的条件。继而对16世纪震撼基督教世界的“宗教分歧”(第二部分,6章)作了详尽描绘,凸显了抱残守缺、反宗教改革的天主教会与冲破桎梏、实行宗教改革的新教之间分歧的焦点所在,让读者看到天主教会设下的种种禁忌是如何阻遏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而新教如何将宗教与世俗生活区别开来,形成了始料不及的解放力量。倘说16世纪初基督教诸民族是从同一起跑线上起步的话,那么中叶之后,各国之间在经济、商业贸易、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差距”(第3部分,9章)则日益显现,有些差距大到可以数百年计。原本比较先进的欧南诸国日益衰落,实行了宗教改革的欧北诸国后来居上,生气勃勃,气象万千。作者以详实的史料为依据,但并未流于简单的历史描述,而是从17世纪新教移民聚集的荷兰如何成了欧洲的新腓尼基人,18世纪的英国如何进行工业革命、实现了腾飞,昔日统治荷兰的西班牙大帝国如何江河日下、日益颓衰,人才和自然资源均不输于英国的法国如何落后于邻国——这些熟悉的史实中寻找出差距的根源。进一步论证了是人的因素,是精神因素使然。当欧洲诸国的发展出现鸿沟时,作者把笔锋一转,关注起“同时代人看差异”(第4部分,7章)问题,生动地再现了从普通人到外交官,从国王的指导神甫到思想家对这些现象所做的近距离观察和反思。伏尔泰对人间天堂——荷兰的赞叹、英国外交官坦普尔首先对差异问题进行的理论研究、法国人眼中德意志人的精神实用主义、令外国人惊诧的西班牙人“有失贵族身份”的顽念,都是对现实的直击。读者也可以看到英国政治家,如弥尔顿、洛克和维特如何回应发展,考量宗教和政治问题。他们推崇言论自由、贸易自由、宗教宽容,自由审度,在舆论上为发展铺路开道。哲学家斯宾诺莎和洛克从理论上对自由,宽容与信任及私有财产之间的关系作了深层次的探讨,奠定了自由的理论基础。佩雷菲特认为,此后不久,人类的思考发生了重大失误,钻进了“发展理论的死胡同”(第5部分,5章)。

古往今来，发展现象引起诸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佩雷菲特着重对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四大理论流派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和梳理，即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理论、马克斯·韦伯的伦理学以及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历史学。佩雷菲特认为用这些理论去阐释社会和经济现实，往往有许多现象解释不了，无异于死胡同。他也对用严谨的数学模式诠释发展现象的各种现代经济学流派逐一进行了探讨，发现他们的学说或模式都建立在“资本”和“劳动”这两大要素之上，有的完全忽略了“非物质第三要素”，即文化要素，有的虽然看到文化因素的作用，但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因此他在研究中进行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创立了比较品性学，认为只有从文化要素着手，才能真正解开发展之谜。要研究欧洲诸国发展的缘起，离不开宗教和神学。作者继第二部分论述宗教分歧之后，另辟专章“天主教会与现代经济”（第6部分，6章），探讨了天主教会的集体思想家——教皇——的教理教义如何从逆历史潮流到顺历史潮流的演变。揭示了作为西方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的宗教对世俗社会的全面渗透与影响，以及数百年里天主教会如何通过教权和教义构成了阻碍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力量。前面这两大部分的理论梳理水到渠成地引来作者创立的新学说。这种新学说既是一种新的理念，也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在“品性学研究方法”（第7部分，即最后一部分，8章）中，作者介绍了品性学的理论源头——孟德斯鸠对人的因素的重视以及黑格尔眼中的信任品性，发掘了商业心理学大师巴师夏，现代经济学的开拓性研究者熊彼特和哈耶克，生物学家康拉德·洛伦兹的行为学对信任品性学的贡献，让读者领悟到品性学是一种介于历史学和人类学之间的人本发展理论。它是开放式的前瞻性的学说。人类千百年的历史演进，有过一次次由盛而衰，由衰而盛的奇迹或神话。但用比较品性学的方法去探讨，个中之谜是可以解开的，因为发展是一种可逆性现象。由是，作者发出警世之言：“没有发达社会”，只有进步中的社会。这与作者的电梯寓言（《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1989）同出一理。基于此理，作者在正文之外还附录了16个以资料为主的章节，名曰《差距残留现象》。点出作者的人文关怀不限于16世纪到19世纪，造成400年里西方诸国悬殊差距的根源依在，因此还有差距残留问题。作者之所以将关键资料附录在后，是想给读者提供自由审度的宽广空间。

钱钟书先生50多年前写过一篇随笔（《英国人民》，1947），谓“讨论民族品性的书往往只是一种艺术作品”，究竟多少人的品性才算得上一个民族的品性是统计学的问题。能不能统计，有没有统计，统计得精确不精确都是个问题，故“对该民族的了解未必具有客观的精确性”。而佩雷菲特恰恰考论的是族群或民族的品性，并将考论上升为一门新学说，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佩雷菲特对比较品性学作了明确的规范，它既不同于“人种学描述性的，但简单化的解说图式”，也不同于“伦理学维护道统、但往往无效的训诫”。佩雷菲特考察的基点不是种族

或人种，而是具有共通品性的群体。这使他避免了偏狭的种族论和人种论，同时也摈弃了“欧洲中心主义”，增大了考察范围的弹性，大可至一个民族，小可至一个社群。从国与国之间、一国之内不同区域或社群之间的品性差异，钩稽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缘起。换言之，他使族群的品性研究既不落于概而论之的印象推测，也不流于艺术作品特有的潇洒的模糊，而将其提升为具有客观准确性的学科。他指出，品性学“就是研究人类不同族群各自的行为和观念，研究这些行为和观念在交易、文化流动性、地理流动性以及创新方面构成激活因素还是抑制因素”。他认为，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从马科斯·韦伯到费尔南·布罗代尔，历代思想家理论家都不断地探索国家富裕和贫困的根源，但他们大多从资本、劳动、自然资源、气候、地理条件等物质因素上解释原因，这都有失偏颇。必须来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将物质要素放在第二位，将非物质第三要素置于第一位。从方法上讲，佩雷菲特不从要多少人的品性才能算一个民族的品性这种几乎无法用统计学加以证实的难题着手，而是采用一种反证，考察崇奉不同文化价值的族群或群体成就的业绩。业绩有着严谨的衡量标准，可作量化分析，从而证明在基本相同的物质条件下，有无这样或那样品性的群体会形成怎样的经济差距，以此凸显人文价值、文化要素在经济发展中的第一性作用。他从大量史实中发现，举凡经济腾飞的国家，社会成员皆相互信赖，这种精神状态有利于打破传统禁忌，促进创新、变革、竞争，引领社会不断进步。反之，社会成员互疑的社会总是阻碍改革和创新，必然滞后。由是，作者形成了这样的信念：“最强大最能产生积极成果的社会关系是建立在互信基础上的关系：男人与女人之间、父母与孩子之间、上司与下属之间、同一国度的公民之间、病人与医生之间、学生与老师之间、出借人与借贷人之间、业主与合伙人之间的互信”（前言）。佩雷菲特深知“打破学科之间的疆界”，阐释“发达与不发达这类如此普遍和关键的现象”是冒险的探索，但基于对第三世界的了解使他坚信：“被传统自由主义理论家及社会主义理论家视为经济发展函数的两要素——资本和劳动力——实际上是次要因素；主要因素，即能给这两个传统要素添上正、负指数的主要因素则是第三要素，20年前我把它叫做‘非物质第三要素’，换言之，文化要素”（前言）。这两段表述可以视为《信任社会》的精髓。

本书用了不少篇幅（第2和第6部分）论述宗教问题，揭示了宗教信仰和宗教改革对西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但作者并不囿于基督教不同教派的教义内容，而是分析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



革所宣扬的伦理价值对不同信众产生的作用，如何形成思想解放力量或抑制力量，这种力量如何与国家的盛衰息息相关。这样，作者虽仅限于探索欧洲基督教三大教派的伦理和影响，但却具有普遍意义。对于只有淡薄模糊的宗教背景，尤其是对西方基督教陌疏的中国读者来说，不会构成理解上的困难，完全可以视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从这种或那种价值的抑扬贬崇，透视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关系。例如，读者可以了解并意识到宗教改革家加尔文的杰出贡献，却不会陷入宗教改革等于经济腾飞的简单化等式推论，因为新教倡导的伦理价值与兴业者的理念之间不可能划等号，而只是存在“择亲和势”。这也解释了并非所有信奉新教的社会皆出现经济奇迹的原因。

佩雷菲特在《信任社会》中不仅系统阐发了他在《法国病症》（1976）一书中业已提出的“非物质第三要素”这一具有决定意义的理念，而且展示了他独到的研究方法，这就是比较。他之所以选择欧洲基督教诸民族作为研究的对象，正是基于方法的考量。同一个人种，同一种文化，同一个教会领导，同一种封建体制，在各方面如此相同的条件下进行差异比较，不仅是经济成就的系统比较，而且是不同观念不同品性的比较。这种方法最具说服力，使“欧洲中心论”、“人种论”及“种族主义”不攻自破。这样的分析比较使结论带有普遍意义。同等条件进行比较，不同条件也进行比较，佩氏这种严谨的研究方法令人自然联想到贯穿于他考察和探究中国社会和法国社会而写出的那些脍炙人口的论著（《当中国觉醒之时》和《中国已经觉醒》及《法国病症》）。佩雷菲特的专著能迅速走出专家的象牙之塔，广为流传，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他的方法论——科学比较。难怪有人将他比作20世纪的托克维尔。

《信任社会》涉猎面极广，参考书目浩繁，但作者在宗教问题上着墨过多，而对于无神论和启蒙时代哲学家对西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和作用却极少提及，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

《信任社会》面市后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迅成经典，被援引率极高。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埃维·盖马认为他提出了一个“根本的观念”。里昂一位读者惊叹：“这部书堪称独一无二。以往论述经济发展的书很多，但一般说来都限于描述，重点放在科技进步的作用或制度的作用上。而此书作者的研究却独辟蹊径，从探索集体心理入手，揭示它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法国已故总统密特朗的智囊雅克·阿达利认为，“他的‘信任社会’理念和布罗代尔的‘经济世界’理论同样重要。佩雷菲特揭示了‘气候’的重要性，即社会—文化—政治环境的重要性。”法国社会历史学家、法兰西研究院院士罗朗·德拉哥认为，《信任社会》表明佩雷菲特对世界前途的关怀，显示他“承继了卢梭和托克维尔的精神，孜孜不倦地探寻国家和社会命运之奥秘的钥匙”。

在全球化的今天，探索富国强民之道成了各国首要研究课题。从这一点讲，《信任社会》无论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具

有普遍意义。佩雷菲特探究发展之缘起，一方面对发达国家进箴言：发展绝非一劳永逸，惟持续发展才能保持发达。另一方面对发展中国家也发出衷告：经济腾飞并非简单的技术和资本引进，亦非刻意模仿富国的物质成功，而应以建设信任社会为富国强民之道。这部书对中国来说尤具现实意义。今日之中华，急速奋进，百业勃兴，外资涌流，设备弥新。然而这个前进速度能否保持下去，能否真正将中国建设成世界一流强国，确有个关键问题，就是社会信任。许多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信任稀缺现在成了中国的社会问题。试想一下，倘若人们对每件商品都“草木皆兵”，疑有掺假，那么这样的社会究竟能前进多远？佩氏的《信任社会》可谓有史鉴之效。

